

代 序

領略軍事戰略研究的思想境界

——讀李際均《中國軍事戰略思維論》感言

《中國軍事戰略思維論》是李際均中將的一部力作。李將軍作為戰略思維與戰略文化研究的先行者，在書中以此為視角展開了廣泛而深入的探索。這本書中涉獵的軍事學術門類相當廣泛：從軍事哲學到軍事辯證法，從戰略思維到戰略文化，從戰爭歷史到戰略遺產，從地緣政治到聯盟戰略，從戰爭動因到維護國家主權，從新軍事革命到國際戰略控制，從軍事鬥爭準備到祖國統一大業，從強邊固防到經略海洋，從戰爭計劃到戰略戰役主動權，從古代單兵戰術到當代高科技戰爭等一系列軍事戰略問題，給讀者以豐富的精神營養、學術啟迪和愛國主義教育。

書以載道，文如其人。一個人的著作就是他的心聲，反映其歷練、教養、風骨和情操。作為經歷過抗美援朝戰爭戰火考驗並且在戰爭中入黨的老兵，李將軍不僅清正廉潔，更以其不老的軍事理論追求，讓我們看到了用血汗凝成的文字背後的底蘊、激情、忠誠與戰略智慧。

一、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懷

作者用他一輩子的思考告訴大家，什麼是其信仰，如何堅守信仰。只有至誠才能傳遞出至真，因為至真，才讓我們有幸仰視前輩畢生擎舉的理想之光，如此純粹，如此炫目。細讀這部作品，字裏行間無不深切感到作者對祖國那份執著的責任、摯愛與忠誠，而且這份情愫任歲月流逝、地位變化，從未有過絲毫動搖。愛國愛軍、強國興邦、知兵謀勝，始終是他從事戰略思維研究的原動力。對此，他曾深情地吐露過自己的心聲：“不尋常的年代是一所偉大的學校，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都會有一種無法磨滅的愛國激情。”的確，老一輩人是帶著英雄時代的體溫和熱血一路走過來的。正如作者所說：“我們今天是以先烈的血淚洗面才得以容光煥發……我慶幸自己是中國人，並且生活和成長在充滿激蕩、艱辛和進行偉大變革的歷史時期，作為投身革命事業的後來者，趕上參加開國第一戰，從少年到白頭，保衛祖國就成為自己人生事業的起點和歸宿。”他把自己的研究定位為“一個普通的中國軍人，懷著強國興邦的夙願，參與我們飽經憂患的、偉大的中華民族的集體沉思”。在這個不少人質疑一切、刻意迴避崇高的年代，為什麼這些話能如此直擊人們的心靈？當一個人將自己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緊緊地聯繫在一起的時候，當一個職業軍人和優秀學者把自己的全部才華用於為祖國服務的時候，那麼一個昂首挺立的、大寫的軍人就會佇立我們的面前。

作者強調愛國主義是歷史的永恆主題，是中國人民的第一信仰、第一人格。他認為，國家和人民利益是戰略思維的根本點，而維護國家的領土主權完整和不受侵犯則是戰略的首要問題。

面對國內傳統文化斷脈、當代文化扭曲、信仰缺失、精神空虛，以

及“告別革命”“去英雄化”等歷史虛無主義的思潮，作者警告說：“一個民族的歷史長河，過去、現在和未來是永遠不能分割的。如果一個民族缺乏氣節和道德戒律，缺乏對民族抗敵歷史的尊重、對國家恥辱的銘記、對死難同胞的悲憫、對革命志士的緬懷，那是沒有希望的。”他堅信統一是我國歷史發展的主流。歷經數千載滄桑，中華民族的認同始終如一。謀求國家的獨立和統一是中華民族高於一切的社會心理、道德觀念、民族感情和價值判斷的標準。對於國家統一和領土主權的態度是戰略家乃至普通公民的政治品質的底綫。

2009年11月，應我國台灣地區太平洋文化基金會的邀請，作者參加了“兩岸一甲子”學術研討會。他在發言中說，台灣當局“承認‘一個中國’比養50萬大軍還管用”，並強調，大陸的導彈不是威脅，“台獨”才是威脅。他呼籲兩岸共同協防南沙，維護南海、東海主權。他說：“中華民族的統一和復興是大勢所趨。基於中華民族大義，相信有著黃埔精神傳統的台灣軍人不會為‘台獨’而戰。在‘一個中國’的框架下，兩岸軍人同屬中國軍人，不應該兵戎相見，而應該共同負起捍衛中華民族固有的領土主權、維護中國國家安全的神聖使命。”他的話在海內外引起了巨大反響。

作者早年參加抗美援朝戰爭並在戰爭期間入黨。抗美援朝戰爭以其光榮、慘烈、艱苦而載於史冊。作者指出，它不僅是“兩種哲學、兩種智慧、兩種道德和勇氣的較量”，而且是一座偉大的熔爐，是攸關天下興亡，鍛鑄民族之魂，考驗一個國家和人民的意志和生存能力，特別是國家領導者戰略智慧、膽識與魄力”的戰爭。中國人民志願軍不僅創造了步兵進攻穿插作戰速度的奇蹟，也創造了戰勝極度艱難困苦、英勇頑強的極限。書中寫道：“中國今天能這樣站立著，是因為當年中國人民志願軍在三八綫、上甘嶺站立著。”有人公正地評價

說，一百年裏第一次為中國人抹去那黑色屈辱胎記的，是那些藐視一切敵人、勇往直前的志願軍將士，我們今天仍然享受著他們給我們的恩惠。

1997年7月，作者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代表團團長應邀率團訪美。啟程之前，《華盛頓郵報》發表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共和黨前首席顧問威廉·特里普利（W. Triplett）的文章，其中說作者“有同美軍作戰的經歷”，“1989年曾任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如果亞伯拉罕（S. Abraham）參議員的制裁中國法案還有效的話，李將軍就不能得到進入美國的簽證”。對此，作者在美國陸軍學院演講結束時回應說：“20世紀50年代初，我在朝鮮戰場開始自己的軍旅生涯。……誰敵視中國，誰就會給自己製造12億個敵人，並將為此付出極高的代價。”“走出戰壕便是和平之路，對於軍人來說，用酒杯瞄準比用槍炮瞄準好。”最後這句話，成為世界軍事外交宴會上的名言。作者的演講得到了美國軍方的高度評價，稱他是中國“最受尊敬、最有影響的戰略專家之一”。

二、深刻的國際戰略觀察與對策研究

作者在書中指出，超級大國引導的新軍事革命不會使發達國家更安全，反而會使世界更不安全。掌握高科技能力的國家，必須從全球安全出發，避免科學技術力量無限制地向戰爭力量異化，否則必將給人類帶來深重的災難。如果失去理性，人類創造文明的力量也可以變成毀滅文明的力量，改造世界的能力有多大，破壞世界的能力就有多大。他指出，霸權主義就是放大的恐怖主義，沒有道德的政治就是壓迫，沒有道德的軍事就是屠殺，沒有道德的經濟就是掠奪。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的戰爭運動走向正義戰爭的反面，朝鮮戰爭、越南戰爭、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和利比亞戰爭接連上演，目前它還在尋找新的戰爭目標。作者當時就指出，科索沃戰爭是“和而不平”，阿富汗戰爭是“消而不滅”，伊拉克戰爭是“勝而不利”，並且預言，“伊拉克戰爭會變為取勝最快、打掃戰場最慢的戰爭”。這些預言後來都成了事實。

作者在一次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批評自詡為“戰爭總統”的小布什時說，全世界都應該認同在絕對的軍事力量之上，還有一個絕對的道德原則，否則，全球化就會是霸權化，“新戰略”就會成為新戰爭，“世界新秩序”就會變成世界無秩序，“高技術、零傷亡”的反恐戰爭就會成為強權國家對弱小國家隨心所欲的殺戮。他進一步指出，對高技術戰爭的反制理論與戰法的出現才算是新軍事革命的完整表達，其中就包括非對稱戰略：在作戰上，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發揮你的優勢，我發揮我的優勢）；你哪裏怕打，我專打你哪裏。在裝備發展上，你發展你的，我發展我的；你怕什麼，我發展什麼。幾句話道出了非對稱戰略的實質。

作者指出，帝國主義統治世界兩個世紀造成的自我中心的思維定式、霸權情結、擴張慣性，妨礙了其重新思考與認識當今世界的能力。須知，誰也沒有給西方大國賦予壟斷人類價值觀的權力，更沒有授予它們任意給別國下定義的權力。剝奪別的民族自由的民族是不自由的，侵害別國安全的國家是不安全的，維護自身安全的保證是尊重別人的生存權利。

三、科學的認識論、方法論與嚴謹的思維邏輯

作者認為，軍事戰略思維是帶有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戰略思考。戰略思維的本質是一種對策性思維。它不僅僅是學術問題，更是“起自學術，終及國家”的大問題。在構建自己的學科體系時，作者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以科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統領全書，做到了其思想的邏輯統一性。

作者強調，軍事研究不是從概念到概念、從觀念到觀念的經院式推導，不是用規律自身說明規律，軍事理論之花不能脫離戰爭實踐的土壤。軍事學術研究的任務是把軍事實踐上升為理性認識又反過來指導軍事實踐。他對《易經》“師左次，無咎”的考證表明這個原則最初是由冷兵器時代單兵戰術演化而來的，而且直到現代的坑道戰、巷戰仍然適用。只有具備實戰經驗的人才能作出這樣專業的解讀。

作者充分利用自己在抗美援朝戰爭和參加部隊演習獲得的直接經驗，加上研究古今中外戰爭的間接經驗，進行新的學術探索。1983年，時任71師師長的作者在當時權威的《紅旗》雜誌和《哲學研究》雜誌上分別發表了《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特點及其歷史地位》和《指導戰爭的科學方法論》，這兩篇論文當年同時獲得優秀論文獎，這在包括當時中國理論大家在內的研究者中也是絕無僅有的。作者對毛澤東軍事戰略思維的特點進行了精闢的概括。例如，毛澤東確立了從偵察、判斷、決心到部署的一系列互為前提的軍事認識與戰爭指導的邏輯程序，強調認識情況的兩個過程的循環反覆，不斷使主觀指導與客觀實際相一致；研究作戰部署必須立足於能夠對付出現最複雜、最困難的情況；戰略上藐視、戰術上重視，戰略上有規則有定向、戰術上無規則無定向；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等。作者認為，毛澤東軍事戰略思維是中國

軍事戰略思維的最高表現，它是當代中國軍事戰略思維的原點和寶貴的軍事思想遺產。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歷史榮譽是和毛澤東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的。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作者擔任“萬歲軍”（即第 38 集團軍——編者註）軍長，而中國陸軍的改革與轉型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的。當時該軍受領機械化集團軍試點任務。作者在書中概括了組建機械化集團軍從論證到實施的經過。他寫道：“單憑直覺經驗無法形成對各個組成部分和總體作戰能力的認識，只有對構成集團軍作戰能力的諸要素進行定量與定性分析和論證，才能提出符合實際的任務目標，並在此基礎上完成戰法研究。通過研究論證，可以加強合成意識，重視兵種建設和使用；可以為優化編制體制和武器裝備結構提供科學依據，同時還能有效地提高指揮員和機關的軍事素質。”他組織機關和部隊對上述課題進行全面、系統的定量與定性分析研究，然後指揮機械化集團軍開展了大規模的實兵對抗演習。時任國防部部長張愛萍將軍親筆書寫了“勇於改革，善於創新，面向未來，建設新軍”的條幅送給作者。

四、戰略文化——歷史與現實的對接

作者寫道：“文化是戰略之母，戰略的底蘊和根基是思想文化。”戰略文化是在一定的歷史和民族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形成的戰略思想和戰略理論，並以這種思想和理論指導戰略行動和影響社會文化與思潮，大戰之後，便是文化使命的展開。因此，在戰爭指導上，了解對方的戰略文化與了解其軍事部署同等重要。中華文明賦予戰略的靈魂就是求和平、謀統一、重防禦。他同時指出，中國傳統戰略文化也有消極的成分，如重文抑武、重道輕器、退讓自保、消極防禦等。因此，對傳統的東西要